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余華

China in Ten Words
Yu Hua

說明

這是我去年斷斷續續完成的一部非虛構作品，裡面一些內容引用了我過去散文中的幾個片斷。今年九月，法國ACTES SUD的法文版是全球首次出版。明年開始，美國和歐洲亞洲南美洲的其他國家也將陸續出版。根據美國蘭登書屋編輯的建議，我對此書提及的一些數據進行了更新。儘管如此，明年九月出版的英文版裡的數據仍然可能變得陳舊，因為中國大陸日新月異。

余華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四日

目錄

前言 -- 3

人民 -- 4

領袖 -- 7

閱讀 -- 12

寫作 -- 18

魯迅 -- 26

差距 -- 30

革命 -- 36

草根 -- 43

山寨 -- 47

忽悠 -- 52

後記 -- 58

前言

古希臘的盲詩人荷馬說：「神祇編織不幸，是為了讓後代不缺少吟唱的題材。」幾百年以後，中國的先哲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荷馬借助神祇置身事外的風度，以敘述者的身分來吟唱世事難測和人間不幸。孟子則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說明憂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卻反而使人敗亡。荷馬和孟子從不同的時空和不同的視角出發，以相同的積極和樂觀，在我們今天的不幸和憂患裡走到了一起。

我希望此書兼備上述兩種品質讓超然的敘述和真切的人生在這裡殊途同歸。我也希望在這十個詞彙裡，能夠繼承荷馬與孟子的積極和樂觀。

我要感謝白亞仁教授。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在美國期間，白亞仁邀請我前往波姆那學院（Pomona College）講述當代中國。這位老朋友將我的演講題目定為「一個作家的中國」，我就是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發現了這本書。我們驅車行駛在洛杉磯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我告訴白亞仁計畫寫作這本書。白亞仁立即表示願意承擔此書的英文翻譯。當我回國後決定自己的寫作從十個詞彙出發，白亞仁就將書名建議為《十個詞彙的中國》。我喜歡這個書名的簡潔風格。

很久以前，義大利詩人但丁寫下了樸素的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但丁只是輕輕地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我們感受到了速度。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

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荷馬所說的不幸與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

所以，我如果面面俱到地敘述當代中國，我的敘述將會難以為繼，將會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還要漫長。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選擇十個詞彙的理由，因為十個詞彙給予我十雙眼睛，讓我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

我要求自己的工作簡明扼要，從我們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開始敘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瑣碎，其實包羅萬象，它們豐富、寬廣和激動人心。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等等，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發出自己的鳴叫。日常生活就像廣闊的森林一樣，恰巧中國有句俗語：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我寫作此書如同一位往返的巴士司機，起點也是終點。我滿載故事的巴士從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經過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的驛站，還要經過一些地名不詳之鄉，一些故事中途下車，另外一些故事中途上車，如此上上下下的長途跋涉之後，我的巴士又回到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

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

如果荷馬的超凡脫俗和孟子的切膚之痛影響了我走向目標的步伐，我會感激在心。

人民

我在寫下這個詞彙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寫錯了，或者說寫得不像是「人民」。我閉上眼睛休息一會兒，睜開眼睛後覺得它有點像了；我再次閉上眼睛，當我再次睜開眼睛時，終於確定自己沒有寫錯。這個詞彙就是這樣，讓我有時候陌生，有時候熟悉。

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樣處境奇怪，它無處不在，同時又被人視而不見。今天的中國，好像只有官員們還在張口閉口說着「人民」，人民卻很少提及這個詞彙，或者說正在遺忘它。多虧了官員們的唾沫，這個詞彙才顯示了自己仍然存在。

在過去，這個詞彙曾經是那麼的顯赫。我們的國家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毛主席說「為人民服務」；當時最重要的報紙叫《人民日報》；我們這些單個的人民天天說：「一九四九年以後，人民當家作主了。」

在我童年的歲月裡，「人民」是和「毛主席」一樣了不起的詞彙，我剛剛認字的時候，最先學會的就是這兩個詞彙，然後才學會寫下自己的名字和父母的名字。年幼的我曾經認為：「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當時正在經歷文化大革命，我得意洋洋地到處宣布自己的發明，我看到很多疑惑的表情，他們似乎覺得我的發明有待商榷，可是沒有一個人明確表示反對。那時候人人謹小慎微，只要說錯一句話，就有可能成為反革命分子，從而家破人亡。我的父母聽到我的發明時也是這樣的表情，他們小心翼翼地看著我，拐彎抹角地表示：這句話好像沒有說錯，可是最好不要再說了。

這是我童年裡最重要的發明，我捨不得不去說，我繼續將它掛在嘴邊。有一天我突然為自己的發明找到了證據，那時候流行這樣一句話：「毛主席在我們心中。」我發揮了這句話，我說：「每個人民心中都有毛主席，毛主席心中有什麼？有我們全部的人民。」所以，「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

我看到疑惑的表情在我們的小鎮上逐漸消失，有人開始點頭表示同意，有人開始也這麼說了。先是我的小夥伴們這麼說，接著大人們也這麼說。

當很多人都在說：人民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就是人民。我的危機感出來了，革命的年代裡是沒有專利的，我發現自己作為發明者的身分正在迅速失去。我到處申明：「這句話是我第一個說出來的。」

可是沒有人對此有興趣，最後連我身旁的小夥伴們也不承認這句話是我的發明，面對我的據理力爭，或者可憐巴巴的哀求，他們個個搖著頭說：「大家都這麼說。」

我開始傷心，甚至後悔莫及，後悔將這個發明公諸於世，我覺得應該將這個發明永遠藏在自己心裡，不讓任何人知道，獨自享用一輩子。

這些年來，西方驚訝中國的巨大變化。歷史在中國就像川劇中的變臉，短短三十年，一個政治至上的中國，搖身一變成為了一個金錢至尊的中國。

當歷史轉折的時候，總會出現某個標誌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如此。北京的大學生走出校門，匯集到了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自由，同時反對官倒。由

於政府拒絕與學生對話的強硬立場，學生開始絕食，市民們走上街頭聲援絕食學生。當時市民對「民主自由」其實興趣不大，吸引他們大規模加入到這個運動中的是「反對官倒」的口號。那時候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進入了第十一個年頭，雖然改革帶來了物價上漲，可是經濟穩定增長，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農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九〇年代工廠的大規模破產倒閉還沒有來臨，很多工人還沒有成為受害者。當時的社會矛盾並不突出，不像今天的社會到處燃燒著怒火，當時的社會僅僅是洋溢著怨氣，對一些高官的子女們利用國家的資源發財致富不滿，這樣的不滿情緒在反對官倒的口號裡聚集了起來。現在看來，當時少數人「官倒」的腐敗和今天大規模的五花八門的腐敗比較起來實在不算什麼。

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腐敗增長的速度和經濟的增長一樣驚人。

這場席捲中國的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在六月四日凌晨的槍聲裡很快安靜下來了。同年的十月，我再次去北京大學的時候，已經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了，天黑之後未名湖畔出現了一對一對戀愛的身影，學生宿舍裡傳出來搓麻將的聲音和背誦英文單詞的聲音。僅僅過去了一個夏天，一切都改變了，彷彿春天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發生。如此巨大的反差似乎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天安門事件標誌著中國人政治熱情的一次集中爆發，或者說標誌著從文革以來積累起來的政治熱情終於一次性地釋放乾淨了。接下來掙錢的熱情替代了政治的熱情，當萬眾一心掙錢的時候，一九九〇年代的經濟繁榮自然來到了。

然後，嶄新的詞彙鋪天蓋地而來了。比如經常上網的網民、炒股的股民、購買基金的基民、追星的粉絲、下崗工人、農民工等等，正在支解瓜分「人民」這個業已褪色的詞彙。在文革時期，「人民」的定義十分簡單，就是「工農兵學商」，這裡的「商」不是指商人，是指從事商業工作的人群，比如商店的售貨員。我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讓「人民」內容脫胎換骨的分水嶺，

或者說讓「人民」進行了資產重組，原有的內容被剝離，新的內容被置換了進去。

從文革開始到今天的四十多年，「人民」這個詞彙在中國的現實裡好像是空的。用現在中國流行的經濟術語來說，「人民」只是一個殼資源，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內容用它借殼上市。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學生和市民自發地承擔起了警察的責任，我想，這樣的北京也許再也不會出現。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願望，讓一個沒有警察的城市秩序井然。只要走上街頭，你就會感到親切友好的氣息撲面而來，不用買票就可以乘坐地鐵和公交車，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微笑，人與人之間沒有了陌生感。我們常見的街頭爭吵沒有了：平日，裡斤斤計較的小商販們，免費向遊行的人群供應食物和水；退休的老人從他們微薄的銀行存款裡取出現金，捐給廣場上絕食的學生，還有小偷們，他們以偷盜協會的名義發出公告：為了聲援絕食學生，停止一切偷盜行為……當時的北京，可

以說是一座「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城市。

生活在中國的城市裡，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就是人多。可是經歷了天安門廣場的

百萬群眾大遊行之後，你才會真正感受到：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的壯觀景象。一些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站在廣場的一隅，或者站在街頭日復一日地演講，嗓子啞了，甚至說不出聲音了，仍然頑強地說著。圍觀的人是男女老少，不論是飽經風霜的老者，還是懷抱嬰兒的母親，面對年輕學生稚氣的臉，甚至是稚氣的話，都是滿臉尊重的表情，頻頻點頭和熱情鼓掌。

也有讓我感到滑稽的時候。有一天下午，我來到建國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間昏暗的大屋子裡，參加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一個聚會，在等待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之一的嚴家其時，我看到幾個人在指責一家報紙的副總編輯，這家報紙剛剛發表了一份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的聲明，這幾個人的不滿是因為他們在聲明中的署名位置太靠後了，在他們前面的署名裡有幾個人沒有他們的名氣大。他們責問為什麼把沒有什麼名氣的人放在他們前面？那位倒楣的副總編輯一再解釋不是他的

責任，甚至道歉的話也說了，可是這幾個人還是不依不撓。直到嚴家其的出現，這齣鬧劇才算結束。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嚴家其，以後沒再見到過他。我清晰地記得那天下午的情景，這位當時能夠經常見到趙紫陽的著名學者，心事重重地走進了這間昏暗的大屋子，人們安靜下來，嚴家其帶來了一個壞消息，他聲音低沉地說：

「紫陽住院了。」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裡，政治人物只要是以身體有病的理由住到醫院，就意味著失去了權力，或者意味著躲避了起來。嚴家其帶來了趙紫陽住院的消息，那間大屋子裡的知識分子們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有人開始悄悄地溜走，然後這些知識分子就像是落葉在秋風中散落那樣離去了。

天安門事件之後，趙紫陽銷聲匿跡，直到二〇〇五年逝世，新華社才為這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發布一條簡短的新聞：「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一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五歲。」

在中國，就是一位退休的部長去世，官方的報導也比這條新聞豐富得多。這條新聞裡沒有介紹這位黨和國家前領導人的生平，也沒有提及遺體告別的日子。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個上訪者的群體，卻知道趙紫陽遺體告別的日子。我不知道這個中國社會裡最為弱勢的「人民」是透過什麼渠道獲得的，他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去向趙紫陽的遺體告別，警察理所當然地將他們拒之門外，因為他們沒有遺體告別的准入證，他們就外面拉開橫幅，緬懷和悼念趙紫陽。

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上訪者，是中國社會腐敗的牲品。他們遭受了各種冤屈和欺壓，他們曾經滿懷希望訴諸法律，希望中國的法官們能夠還給他們公正，可是中國司法的腐敗讓這些人對法律完全絕望了。他們來到北京上訪，期望更高級別的官員可以為他們伸張正義。這些人被稱為是中國的「司法難民」。

中國有一個建立在法律之外的信訪制度，讓蒙受不同冤屈的人有一個殘存的希望，讓腐敗和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幻想還有清官的存在。這是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人治傳統

的影響，人們對清官的期盼超過對法律的信任。這些上訪者傾家蕩產地東奔西走，夢想著有一天會出現某個清官為自己伸張正義。二〇〇四年的時候，中國官方公布的上訪案件已經高達一千萬起。這些上訪者的艱難生活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他們忍饑挨餓露宿街頭，像乞丐一樣被警察到處驅趕，還被少數生活優越的知識分子稱之為精神病人。

就是這樣的一個弱勢的「人民」，二〇〇五年一月的時候來向趙紫陽的遺體告別了。他們認為趙紫陽是「中國最冤的人」，比他們還冤。他們雖然飽受冤屈，可是還有上訪的機會，他們說冤枉的趙紫陽都「無處上訪」。

五月底我回到浙江，處理完家事，六月三日下午坐上火車返回北京。我躺在硬臥車廂的上鋪，聽著車輪在鐵軌上發出的隆隆響聲，車廂裡亮起了燈光，我知道黑夜來臨了。那時候我覺得這場漫長的學生運動就像馬拉松，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可是清晨我醒來的時候，火車接近了北京，我聽到車廂裡的廣播響起，播音員激昂的聲音讓我明白部隊已經進入天安門廣場了。

六月四日的槍聲之後，無論是北京的還是外地來的大學生開始撤離。我清晰地記得那天早晨走出北京站時人山人海的情景，當人們大規模撤離北京時，我卻不合時宜地返回了北京。我揹著旅行袋茫然地走出火車站前的廣場，與蜂擁而來的人群不斷相撞，我意識到自己也會馬上離開這裡。

我是六月七日離開的，當時因為上海的一列火車被燒毀，京滬鐵路的交通暫時中斷，我計畫坐火車繞道去武漢，再從武漢坐船回到浙江老家。我們幾個人坐在一輛雇來的平板車上，沿著長安街前往北京站。幾天前還是沸騰的北京，幾天後已是滿目冷清的景象，街上幾乎沒有行人，一些燒毀的汽車還在冒著殘存的黑煙，經過建國門立交橋時，一輛坦克駐紮在橋上，砲筒威風凜凜地對著弱不禁風的我們。到了北京站，在擁擠的售票視窗互相推搡，費盡力氣終於買到了站票，那時已經沒有座位票了，進站時受到執勤軍人的嚴格檢查，確定我的臉不像通緝令上所有的人像後，才放我進去。

我從來沒有坐過如此擁擠的火車，車廂裡全是逃離北京的大學生，人和人擠在一起幾乎都沒有了縫隙。麻煩的是，火車駛出北京一個小時後，我必須去一趟廁所，我使勁往車廂廁所的方向擠過去，擠到一半的路途時，我知道擠過去也沒有用了，我聽到有人吼叫著使勁拍打廁所的門，可是廁所裡也擠滿了人，裡面人的喊叫著說門無法打開。我只好將尿憋了三個小時，到了石家莊我立刻下車，出站後先去了一趟廁所，然後找到一個公用電話，給當時石家莊的一家文學雜誌的主編打了一個請求援助的電話，這位主編在電話裡聽完我的講述之後說：

「現在這麼亂，你那裡都別去了，住下來給我們寫小說吧。」

我在石家莊住了一個多月，心猿意馬地寫著小說。最初的時候，電視上每天都在播出抓到了通緝令上的大學生，而且是以滾動的形式反覆播出。這樣密集的滾動播出，以後只有在奧運會期間中國運動員拿到金牌時才會出現在電視上。我身處他鄉，在陌生的旅館房間裡，看著電視上被捕大學生茫然的表情，聽著播音員激昂的聲音，我感受到了什麼是恐怖。

突然有一天，電視的畫面完全變了，沒有了抓到通緝學生的滾動畫面，也沒有了得

意洋洋的解說。雖然抓捕行動仍然在進行，可是電視的播出重新回到了我熟悉的畫面：我們的祖國到處都是繁榮的景象。播音員的聲音，一天前還在慷慨激昂地控訴被捕學生的種種罪行，一天以後就變成了喜氣洋洋地歌頌祖國昌盛的腔調。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天安門事件從中國的媒體上銷聲匿跡，就像趙紫陽的

銷聲匿跡一樣，以後我也沒有看到過有關它的片言隻語，好像這個事件從來沒有發生過，它被徹底摒蔽了。即便是經歷過一九八九年春夏遊行的人，也似乎淡忘了，可能是後來的生活壓力讓他們無暇回憶往事。二十年過去以後，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出現了，就是在今天中國年輕的這一代裡面，很少有人知道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知道的人，也是含糊不清地說：

「聽說有過很多人的遊行。」

二十年的光陰轉瞬即逝，我相信歷史的記憶不會轉瞬即逝。我想，參與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每一個人，不管今天是什麼立場，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時候，都會有屬於自己的銘心刻骨的感受。

我的銘心刻骨的感受就是讓我理解了「人民」這個詞彙。

一個人和一個詞彙的真正相遇，有時候需要一個機會。我的意思是說，每個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有些詞彙雖然相處了一生，可是仍然沒有理解。「人民」就是這樣的一個難題。它是我最早認識和最早書寫的詞彙，其後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流連忘返，不斷出現在我的眼前和響徹在我的耳邊，可是它從來沒有真正進入過我的內心。直到我二十九歲那一年，一個來自深夜的經歷終於讓我真正理解了這個偉大的詞彙。當我和這個詞彙有了真實的而不是虛擬的相遇，我所說的不是語言學或者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意義上的相遇，而是人生經歷裡的一個真實的相遇，一個去除了所有理論和定義之後的活生生的相遇，然後我才能夠告訴自己：「人民」這個詞彙不是空的。因為我曾經見到過它有血有肉的模樣，見到過它心臟的強烈跳動。

我對「人民」的理解，並不是來自於天安門廣場百萬人的大遊行，而是發生在五月下旬深夜的一個小小經歷。當時的北京已經戒嚴，學生和市民自發地守衛起了北京的各個交通要道，以及所有的立交橋和地鐵出口，阻止全副武裝的軍人進入天安門廣場。

那時候我住在北京東邊十里鋪的魯迅文學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騎著一輛各個部位都會發出響聲，可是車鈴不響的破自行車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騎車回到學校。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的北京，中午很熱，可是深夜就冷了。我記得有一天中午出發時，因為太熱只是穿著一件短袖的襯衣，到了深夜的時候，我感到了寒冷，騎車從廣場返回學校，冷風迎面吹來，讓我身體的每個部位和破自行車的每個部位一樣抖動起來。我騎車在路燈熄滅的街道上，月光為我指路。我愈往前騎車，愈是感到寒冷。在逐漸接近呼家樓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有一股熱浪在黑暗裡輕微地湧來，隨著我繼續往前，熱浪強烈起來了。接著，我聽到遠處有歌聲在飄揚過來；再接著，我看見遠處有燈光在閃爍。然後驚人的場景出現了，在熱浪滾滾而來時，我看到了燈火通明的呼家樓立交

橋，橋上橋下有一萬多人守衛在那裡，他們激情滿懷，在夜空下高唱國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他們雖然手無寸鐵，可是堅定自信，他們認為自己的血肉之軀可以阻擋部隊和坦克。他們聚集在一起熱氣沸騰，彷彿每個人都是一支熊熊燃燒的火把。

這是我生命裡重要的時刻。在此之前，我一直以為光應該傳得比人的聲音遠，人的聲音又比人身上的熱量傳得遠。可是在我二十九歲的這個深夜，我發現自己錯了。當人民團結起來的時候，他們的聲音傳得比光要遠，而他們身上的熱量傳得比他們的聲音還要遠。我終於真正理解了「人民」這個詞彙。

領袖

我這裡所說的領袖擁有這樣的特權，就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國慶盛大遊行時，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向遊行的群眾揮手，其他領導人沒有揮手的權力，只能站在他身旁鼓掌。毫無疑問，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身穿軍裝登上天安門城樓，不知道是因為天氣太熱，還是因為高興？他常常脫下軍帽，向遊行的群眾揮動起了手裡的軍帽。毛澤東最具魅力的揮手情景，應該是他暢遊長江以後，身穿浴衣站在船頭向兩岸的群

眾揮手致意。

這位領袖將政治家的審時度勢和詩人的我行我素集於一身，他的深謀遠慮時常以即興的方式表達出來。

文革開始，大字報出現了。這些張貼在街頭牆上的大字報像中國傳統建築的窗戶一樣大，少則兩張紙上下排列，多則五、六張紙貼成一排。這可能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書法展示，醜陋的字體遍布中國城鎮的大街小巷，偶爾也有漂亮的字體。人們站在街頭津津有味地閱讀，雖然大字報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革命語言，可是大字報對平日裡耀武揚威的官員們開始指名道姓的批評，讓閱讀的群眾感到十分興奮。

大字報的出現可以說是弱勢群眾挑戰強勢官員的最初行為，這樣的行為受到共產黨中央和北京的一些高官壓制以後。毛澤東，這位強權人物不是利用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去糾正，而是採取了與弱勢群眾相同的做法，也寫了一張大字報：「砲打司令部」。他在自己的大字報裡指出，中國共產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一個是無產階級司令部，另一個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可以想像當時群眾的狂熱，偉

大領袖毛主席都寫出了大字報，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毛主席也有著和普通群眾一樣的遭遇。不言而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刻像熊熊燃燒的火焰一樣吞噬了中國。

綜觀中國的歷史，無論是貴族出生，還是草根出生，凡是成為了皇帝的，都是約定俗成的皇帝嘴臉和皇帝言行。只有毛澤東例外，他成為領袖之後，常常不按領袖的方式出招，讓他身旁的共產黨領導們時時措手不及。毛澤東深知如何在群眾中間煽風點火，文革初期他頻頻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狂熱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讓文化大革命的潮水一浪高過一浪。

暢遊長江更是顯示了這位領袖的獨到風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澤東突然出現在武漢革命群眾暢遊長江的活動之中，在兩岸群眾的歡聲雷動裡，在高音喇叭裡唱出的〈東方紅〉裡，七十三歲高齡的毛澤東和五千名群眾一起乘風破浪暢遊長江。與毛澤東一起暢遊長江的群眾激動萬分，他們一邊游泳一邊在波動的江水裡使勁高喊「毛主席萬歲」，骯髒的江水嗆進了他們呼喊口號的嘴裡，又灌進了他們的胃裡，可是他們上岸後都說江水「特別特別的甜」。毛澤東暢遊江以後，爬上輪船，穿上浴衣，風度翩翩地向兩岸黑壓壓的群眾揮了揮手。毛澤東只是短暫地揮了揮手，就鑽進船艙更衣去了。後來的新聞紀錄片將毛澤東揮手的情景經過剪輯，變成了毛澤東長時間向人民揮手。宣傳畫上的毛澤東揮手情景，更是不知疲倦地定格了長達十多年。

第二天的《人民日報》這樣說：「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這樣健康，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關於自己暢遊長江，毛澤東在詩詞〈水調歌頭〉裡寫道：「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這就是我所說的領袖，輕描淡寫之間，就將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瘋狂的境地。

毛澤東暢遊長江的情景攝製成了紀錄片，在中國和中國以外的地區反覆放映；也製作成了宣傳畫，貼滿了中國從城鎮到鄉村的牆壁。身穿浴衣的毛澤東在宣傳畫上被工人、農民、解放軍、學生和商業工作者簇擁著，毛澤東微笑地揮手，工農兵學商幸福地做出了奮勇向前的動作。想一想，哪位政治人物會身穿浴衣向人民揮手？只有毛澤東有此不同凡響的風度。

其實抗戰時期他就具有了這樣的風度，當時他還沒有成為中國的領袖，還在

延安的窯洞裡過著苦日子。我行我素的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手一直在自己的褲襠裡摸索著，一邊捉著蝨子一邊暢談中國的抗日戰爭必將勝利。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每次揮手出現時，尾隨其後的共產黨領導們不再是鼓掌了，他們的右手也輕輕揮動起來，因為他們的右手捏著《毛主席語錄》，當時稱之為紅寶書，紅寶書讓他們也有了揮手的機會。當然，他們的手舉得沒有毛澤東高，揮動的幅度也沒有毛澤東大。

文革期間，就是沒有毛澤東出現的場合，這些領導們也是右手輕輕揮動紅寶書，向革命群眾致意。就像現在的女明星沒有化妝絕對不會出現在公眾場合一樣，當時的共產黨領導們手裡沒有紅寶書也絕對不會公開亮相，紅寶書是他們的政治化妝品。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集體領導，當九個政治局常委一起出席新聞發布會時，他們同時向記者們揮手，他們的手舉得一樣高，揮動的幅度一樣大。這時候我就會想起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旁人鼓掌他一人揮手的情景十分突出。撫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國家領袖了，只有國家領導人。

正版的領袖毛澤東逝世多年之後，山寨版的領袖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選美比賽風靡中國的同時，評選領袖的比賽也是接踵而至——時尚領袖、風采領袖、魅力領袖、美女領袖的評選與選美比賽爭豔鬥彩。選美比賽雖然花樣翻新，可是始終局限在「美」上面，比如參賽年齡在六十歲以上「銀美人大賽」，漂亮姑娘們瘋狂喝酒的「醉美人大賽」，還有經過整容手術以後「人造美女大賽」等等。

領袖的比賽沒有局限也沒有邊界，於是各個領域的領袖們層出不窮了。青年領袖、少年領袖和未來領袖等等；創新領袖、地產領袖、IT領袖、傳媒領袖、商界領袖和企業領袖等等……今天中國的領袖之多，令人眼花撩亂。領袖一多，各種領袖峰會自然也多了起來，商界領袖高峰論壇、企業領袖高峰論壇、傳媒領袖高峰論壇等等，這些山寨領袖的高峰論壇，其裝模作樣的程度可與G8峰會相媲美。與此同時，領袖的評選還涉及到了地理和物質的領域，比如風景領袖和電梯領袖。這就是毛澤東之後的今日中國，連電梯們都有自己的領袖了。我不知道明天天亮以後，還會在哪些角落裡冒出一堆新鮮的領袖。

如果評選中國這三十年來貶值速度最快、貶值幅度最大的一個詞彙，我覺得「領

袖」將會毫無懸念地當選。

在文革時，「領袖」是一個神聖和偉大的詞彙，是「毛主席」的代名詞，或者說是毛澤東的私有財產。沒有人膽敢聲稱自己是什麼「領袖」，即便是在夢裡也沒有這個膽量。「領袖」一詞，對於毛澤東之外的所有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禁區。當時流行過這樣一句話「祖國神聖不可侵犯」，然後「神聖不可侵犯」常常掛在了我們的嘴邊。「領袖」就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詞彙，除此之外，「毛」這個姓氏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我的妻子告訴我，她過去生活的小鎮上有一位工會主席姓毛，小鎮的群眾也叫他毛主席，他自然而然地答應了。結果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被打倒了，他的罪行是讓世界上出現了兩個毛主席。這位姓毛的小鎮工會主席從此倒楣。他十分冤枉，眼淚汪汪地申辯，是別人這麼叫他的，不是他自己這麼叫的。打倒他的革命群眾說：

「別人可以這麼叫，你不可以這麼答應，你答應了就是反革命分子。」

童年時，我曾經對自己姓「余」而沒有姓「毛」深感遺憾，心裡經常埋怨我父母的家族裡為什麼沒有姓「毛」的人。我當時不知道，對於平民百姓來說，「毛」既是一個神聖偉大的姓氏，也可能是一個危險的姓氏。

當時有一個流行的比喻，就是將共產黨比喻成人民的母親。我心裡暗暗思忖，如果有母親，必然有父親，誰是我們中國人民的父親？理所當然是毛澤東。我童年的邏輯將中國共產黨變成了毛夫人，可是毛澤東的正宗夫人江青怎麼辦？當時我是文革時期的紅小兵，只知道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不知道中國過去的男可以有幾個夫人，更不會想到今天中國的男人會有二奶和情人。年幼的我左思右想，把自己的腦袋想疼了，也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案。

我小時候心目中的領袖除了毛澤東，還有四位外國領袖。在我小學一年級的教室裡，前面黑板上面掛著毛澤東的肖像，後面的牆上並排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肖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是我最早見到的外國人。我們曾經好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長頭髮，比我們小鎮上女人的頭髮還要長，當時的中國女人都是一樣的齊耳短髮，列寧和史達林在我們看來還算屬於正常的男人髮型。童年的時候，我們是以頭髮的長短來區分男女的性別，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髮型令我們好奇。尤其是馬克思，他蓬鬆的鬚髮差不多遮住了耳朵，我們小鎮上女人的耳朵就像馬克思的耳朵那樣，在頭髮裡時隱時現。好在馬克思還有一臉的絡腮鬍子，阻止了我們對他性別的繼續猜想。可是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竟然無視馬克思臉上絡腮鬍子的存在，公然宣稱：

「馬克思是個女的。」

這個同學差點因此成為小反革命。那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小學有一個二年級的女生，因為把毛澤東的肖像折疊了，讓毛澤東的臉上出現了一個十字架的影子，她因此被打倒，我們都叫她「小反革命分子」。她在全校的批判大會上痛哭流涕，口齒不清地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批判會後，我們一年級的學生被老師召集到一起，要求我們揭發其他隱藏在同學中的小反革命分子。記得有兩個人被同學們揭發了出來，第一個名字我們不熟悉，老師問了很久才知道那是一個三歲的男孩，是揭發者鄰居的孩子，這個男孩說過一句反動的

話，就是在某一個黃昏的時候，他說了一句：「太陽掉下去了。」當時流行把毛澤東比喻成紅太陽，因此我們不能隨便說到「太陽」，就是在黃昏的時候也只能說「天快要黑了」。這個男孩說太陽掉下去了，等於是在說毛澤東掉下去了。

第二個被揭發出來的就是我們班上那個宣稱馬克思是女人的同學，他嚇得臉色慘白。當老師問他是否說過這句反動的話時，他哇哇大哭了，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邊咳嗽一邊結巴地說：

「好像說過。」

我們的老師拯救了他，問他：「是好像說過，還是好像沒有說過？」

這個同學沉淪在驚恐和哭泣裡，語無倫次地回答，一會兒是好像說過，一會兒又是好像沒有說過。直到揭發會結束時，他仍然在「好像」裡不能自拔。「好像」救了他，讓此事後來沒有了結果。

我年幼時曾經以為毛主席就是這位領袖的姓名。那個時代人人嘴上都掛著「毛主席」，這三個字脫口而出時，比叫爺爺爸爸還要親熱；若有人直呼其名，就是大為不敬。好在當時人們常常高呼「毛澤東思想萬歲」，常常高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讓我明白了原來毛主席是姓氏加官銜，毛澤東才是其真正的姓名。

二〇〇九年的端午節，一條搞笑的手機短信在中國流行：「新華社北京五月十八日電：中國科學院成功克隆(clone，生物複製)毛澤東，各項生理指標均達到其盛年水平。新聞發布後，在全球引起強烈反響，奧巴馬(歐巴馬)立即聲明：美國在三天之內廢除和台灣關係法並撤走在亞洲的一切軍事力量。日本首相於當天下令炸毀靖國神社，並承認釣魚島是中國領土並賠償侵華損失十三萬億美元。歐盟聲明解除對華武器禁售。梅德韋傑夫(俄國第三任總統)簽署公告，稱大興安嶺之北三百萬公里土地屬於中國。蒙古向聯合國遞交聲明，稱蒙中兩國歷來是一個國家。馬英九表示一切聽從大陸安排，並申請到國家文史館當研究員。金正日正式通電六方會談代表，按毛主席指示辦。國內形勢迅速扭轉：二十四小時內縣級以上幹部退繳贓款九百八十萬億元；私營企業主動改制歸公；二千五百萬三陪女一夜之間從良；全國股市一片紅；房價下跌百分之六十；十三億中國人民再次唱起了時代最強音：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又出了個毛澤東。」

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變成「中國又出了個毛澤東」，民間的幽默讓這位逝世三十多年的領袖重返人世間，然後全世界為之膽怯，中國的腐敗官僚們更是聞風喪膽，困擾今日中國的歷史問題、外交問題和國內問題通通迎刃而解。這個狂想曲似的幽默意味著什麼？是否表達了很多中國人不滿現實的心態？是否暗示了一些新民族主義者的狂熱？或者說僅僅只是一個幽默，一個對我們今日生存環境自我嘲笑的幽默？我想可能都有，甚至意味著更多。

中國在毛澤東逝世以後的三十多年裡創造了驚人的經濟奇蹟，然而付出的代價更是驚人。二〇一〇年七月初，南非世界盃結束之前我離開時，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的離境免稅店裡插滿了嗚嗚祖拉(一種長約一米的號角)，每支售價一百元人民幣左右。我回國後才知道這些中國製造的出口價只有二元六角人民幣，這個可憐的價格裡還包含了環境污染等等問題。中國浙江的一家企業生產了一千萬支嗚嗚祖拉，可是利潤只有十多萬

元人民幣。一位我尊敬的老者說過這樣的話：中國 是付出一百元掙回十元的GDP增長模式。環境的破壞，道德的淪喪，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叢生，使今天中國的社會矛盾愈來愈激化。幾百上千，甚至上 萬的群眾衝擊政府機關，砸汽車燒房子這樣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

很多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 壓抑人性，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的中 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裡。那個時代人們節衣 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度過一生。

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 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裡，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 來，於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 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 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

鄧小平在毛澤東之後，憑藉其個人的威望倡導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可是這位 老人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思考：發展以後出現的問題，比不發展還要多。

也許正是中國發展以後出現了太多的社會問題，毛澤東在逝世以後才會不斷 「復活」。不久前中國的網絡上曾經出現過一個規模不大的民意測試——「假如毛 澤東在今日醒來」。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認為將是一件好事，百分之十的人認為將 是一件壞事，認為對世界和中國不會再有影響的人只有百分之五。

我無法知道參與這個網絡民意測試的人群組合，如果根據中國網民的人群結 構，我想可能是年輕人居多。今天中國年輕的一代對毛澤東所知甚少，他們也紛 紛加入到讓「毛澤東復活」的行列之中，是否暗示了這樣的事實：「毛澤東復 活」已經成為了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心態的表達。這樣的社會心態錯綜複雜，不同 階層、不同地位、不同觀念和不同遭遇的人，在這裡聚集了相同的不滿，既認真 又搞笑地舉行了借屍還魂的儀式。

「假如毛澤東在今日醒來」的網絡話題討論中，有人詼諧地寫道：毛澤東爬 出水晶棺材，在太陽初升之時，走出毛主席紀念堂的大門，站在台階上看著他既

熟悉又陌生的天安門廣場。這時候一些遊客發現了他，立刻奔跑過來，對著毛澤 東喊叫：「古月，請給我們簽個名。」

古月是一位經常在電影裡扮演毛澤東而在中國出名的演員。

我剛上小學的時候，自豪地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我的論據有兩點：一是我們中國有偉大領袖毛主席，外國的四位領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都逝世了，外國已經沒有偉大領袖了；二是我們中國的人口最多，毛主席 說人多力量大。

可是當毛主席三個世界的理論在報紙上和廣播裡天天出現後，我暗暗傷心 了，沒想到美帝和蘇修是第一世界，日本和歐洲國家是第二世界，而我們偉大的 中國竟然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小國家一起擠到第三世界去了。

年幼無知的我如何能夠理解毛澤東的胸懷？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毛澤東沒 有因此

故步自封，他不滿足於只做中國人民的領袖，他想成為世界上所有被剝削被壓迫者的領袖，他豪情滿懷地說：「哪裡有剝削，哪裡就有矛盾；哪裡有壓 迫，哪裡就有反抗。」他開始思考世界革命，他要解放全世界的無產者，並且付 諸行動，開始輸出革命。很多年過去了，毛澤東對於中國的功過是非暫且不論， 有一個事實卻是愈來愈鮮明，就是毛澤東思想沒有因為他生命的結束而消失，對 於世界的影響反而與日俱增。我發現，對於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毛澤東在 中國做過什麼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歷久彌新，而且像種子一樣在世 界各地「生根開花結果」。

二〇〇九年五月一日，奧地利的人民在維也納舉行了盛大的遊行，他們高舉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的巨幅肖像。類似的情景也在歐洲的其 他城市不斷出現，這是否暗示了這樣一個現實：「毛澤東復活」既是中國本土化 的社會心態，也是全球化的社會心態。如果是，那麼意味著什麼？我想最簡單的 答案就是：世界病了需要革命，就像人體病了需要炎症一樣。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我們一行人組成民間知識分子代表團，訪問尼泊爾。那 時候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已經獲得議會選舉的勝利，尼共(毛)的領導

人普拉昌達成為了新一屆政府的總理。可是就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普拉昌 達已經辭去了尼泊爾總理的職務。我的眼前重現了普拉昌達坐在總理府會客室的情景。他側著身體，用堅定的語氣告訴我們：一萬九千名尼泊爾解放軍官兵今後 的生活和工作，必須得到公正的解決。

也許正是尼泊爾解放軍和政府軍是否應該合併的難題，讓這位倔強的領導人 離開了總理的寶座。

在尼泊爾期間，我們訪問了尼共(毛)解放軍的營地。我們是經過了聯合國 維和部隊的營地後，來到了解放軍的營地。尼共(毛)解放軍的營地雖然設施簡陋，而且沒有槍枝彈藥，可是這支正在等待前途的沒有武器的軍隊仍然紀律嚴 明。我們一進軍營，生機勃勃的景象立刻撲面而來。

當我們進入營房時，我童年小學教室的情景重現了。牆上掛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的肖像，當然還有普拉昌達的肖像。就像文革時馬恩 列史的肖像在中國入鄉隨俗，和毛澤東的肖像同居一室那樣；馬恩列史毛的肖像 也在尼共(毛)的營地入鄉隨俗，與普拉昌達的肖像一起微笑。當五個肖像變成六個時，似乎告訴了我們：革命為什麼會生生不息。

到了晚上，我們和尼共(毛)解放軍軍官聯歡，酒過之後我們全體起立，放 聲高唱文革時將毛澤東詩詞改成的歌曲〈長征〉。我們用中文唱，尼共(毛)解 放軍用尼泊爾文唱，儘管歌唱者的心態不盡相同，可是兩種語言唱出來時，像是 只有一種語言。

文革的時候，不僅毛澤東的詩詞，就是毛澤東的語錄也都被譜寫成了歌曲。 大人會唱，孩子也會唱；有學問的人會唱，文盲也會唱；人民群眾會唱，地主、 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也都會唱。從這個角度說，毛澤東是中國有史以來 最具影響力的歌詞作家。

與此同時，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也在我們的生活裡無處不在。從城市到農 村，從磚

牆到土牆，從屋裡到屋外，布滿了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還有毛澤東如 紅太陽一樣金光閃閃的頭像。我們吃飯的碗上印有毛澤東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 飯」，我們喝水的杯子上印有毛澤東詩詞：「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毛澤

東的詩詞和語錄讓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時刻觸景生情，當我們睡覺時，枕巾上印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床單上印著「在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

廁所的牆上印著毛澤東的頭像，痰盂上印著毛澤東語錄。今天來看，覺得這 兩個地方不應該出現毛澤東，可是當時竟然無人指出這一點。當時人人都這樣 說：

「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

我曾經相信毛澤東時刻都在我的身邊。我做了好事，他老人家會高興；我做 了錯事，他老人家會失望。我童年最幸福的時刻，就是晚上夢見毛澤東。我總共 夢見過他三次，有一次他走到我身旁，親切地摸著我的頭髮，和我說了幾句話。

為此我激動無比，喜氣洋洋地去告訴小夥伴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毛主席 還摸著我的頭髮和我說話。讓我傷心的是，沒有一個小夥伴相信我夢見毛主席 了，他們說我是在吹牛，他們說：

「你怎麼可能夢見毛主席？毛主席怎麼可能到你夢裡來和你說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小夥伴們沒有說錯。「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只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超現實，毛澤東金光閃閃的頭像和毛主席紅色字體的語錄，以無處 不在的方式營造了這個超現實。真正現實中的毛澤東，對於我們來說是那麼的遙 遠和虛幻，只是存在於某個象徵之中。我和毛澤東之間的真實距離，如同我童年 的夥伴們所說的那樣，就是在夢中也不會相遇。

文革時期，我們小鎮上有個人去過一次北京，這個人回來以後聲稱和毛澤東 握手了，他熱淚盈眶地告訴我們小鎮的群眾：毛主席親切地握住他的手，親切地 問他叫什麼名字？時間長達四秒多，然後別人的手搶走了毛主席的手。他萬分可 惜地說：

「差一點點就是五秒鐘了。」

這個人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我們小鎮的英雄，我經常看到他揹著一個黃綠色的 軍用書包，在街上神采飛揚地走去。他的右手因為和毛澤東的右手接觸過，整整 一年沒有清洗，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左手粗大逾一些，又黑又髒像是熊掌。我們小 鎮上認識他的人都会去和他的熊掌握手，然後喜滋滋地互相說：

「我握了毛主席握過的手。」

我長大成人以後，有時候會和來自中國不同地區的朋友們共同回憶文革經 歷，時常說起這件往事，然後知道朋友們生活過的地方也都有這樣的人，有些地 方不止一個。我開始懷疑這個過去的小鎮英雄可能是在吹牛，毛澤東的手是那麼 容易握到的？我心想他可能是擠在天安門廣場上黑壓壓的人群裡，接受過毛澤東 的檢閱，就是那種遠遠地看到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揮手的檢閱。他隱約看見了 毛澤東的手，然後虛構了和毛澤東的握手，當我們小鎮上所有的人都堅信不疑之 後，他自己也信以為真了。

那時候，毛澤東像太陽一樣金光閃閃的頭像總是在天安門城樓之上，而且毛 澤東頭

像的尺寸明顯大於天安門城樓。我幾乎天天要看到這樣威風凜凜的頭像， 在我們的小鎮的牆上隨處可見，我們幾乎天天唱著這樣的歌：

「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 我曾經有過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我大約十五歲左右，站在廣場中央，背景就 是天安門城樓，而且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也在照片裡隱約可見。這張照片並不是攝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而是攝於千里之外的我們小鎮的照相館裡。當時我站著的 地方不過十五平方米，天安門廣場其實是畫在牆上的布景。可是從照片上看，我 像是真的站在天安門廣場上，唯一的破綻就是我身後的廣場上空無一人。

這張照片凝聚了我童年和少年時期全部的夢想，或者說也是很多居住在北京 之外的中國孩子的夢想。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差不多所有的城市和小鎮的照相館 裡，都有一幅天安門廣場的布景，滿足人們畫餅充飢的願望。因為對很多生活在 北京之外的人來說，天安門城樓似乎就是毛澤東的家。我站在虛擬的毛澤東家門 前拍下了一張照片，可惜的是這張照片後來遺失了。

我對天安門城樓的嚮往，其實是對毛澤東嚮往的延伸。文革期間，每一年的 國慶節都有一部關於毛澤東、關於天安門的紀錄片。當這一年的紀錄片發行到我 們小鎮放映時，往往已經是冬天了。我穿著臃腫的棉衣，頂著夜晚的寒風向電影 院走去，然後坐在沒有暖氣的電影院裡，看著銀幕上秋天的天安門廣場，毛澤東 站在城樓上向著國慶節遊行的隊伍揮手致意。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夜色降臨以後，毛澤東他們坐在天安門城樓上，桌上擺著令我垂涎三尺的水果和糕點，廣場的上空被禮花照得一片通明，這是少年時期最 讓我心曠神怡的情景。當時我們過年過節最多是放幾個鞭炮，如此多的禮花在空 中長時間的開放，雖然是在銀幕上，也足以讓我目瞪口呆。

在後來有關國慶節的紀錄片裡，毛澤東的身旁出現了西哈努克，一個被廢除 了王位的柬埔寨國王，還有他的首相賓努親王。西哈努克笑容可掬，賓努親王歪 著腦袋像鐘擺似的不停地點頭。這時候我已經進入了想入非非的少年時期，西哈 努克和賓努的兩位年輕美貌的夫人吸引了我，她們在以後的國慶紀錄片中每一次 出現，都讓我感到是找到了紀錄片的主題。而白天的遊行和夜晚的禮花對我來說 已經不重要了，西哈努克和賓努成為了這個世界上最讓我羨慕的兩個男人。尤其 是那個賓努親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樣了，而且連頭都抬不直，可是他的夫人卻 是如花似玉。

有關毛澤東最為漫長的記憶，應該是來自我房間的房頂。我的父親每年都要 更換一次房頂上的舊報紙，一方面是為了防止灰塵掉下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美 化我們的房頂，當時我們居住的房間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上面的瓦片，所以我父親就在房頂上糊上一層舊報紙，讓我們感到上面的瓦片被隔開了。我的童年和少 年時期就是在舊報紙下面度過的，只要我躺到床上，我就會看到舊報紙上面所有 的標題，舊報紙上的文章因為高高在上就無法看清。幾乎是每一年國慶節出刊的 報紙上，第一版都是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巨幅照片。毛澤東最早出現在我 的房頂上時，他身邊站著的是劉少奇；沒過多久，劉少奇就消失了，林彪站到了 毛澤東的身邊，還是沒過了多久，林彪也消失了；然

後，一個名叫王洪文的文革 造反派出現在毛澤東身邊。毛澤東身邊的人不斷更換，而每年國慶節報紙第一版 的整版照片裡唯一沒有更換的人就是毛澤東。隨著我房頂舊報紙的更換，我看著 毛澤東的形象逐漸衰老，後來因為國慶節報紙的第一版不再刊登實地拍攝的毛澤 東照片，改用當時統一的掛滿全國的毛澤東像，毛澤東在我房頂上的衰老才被制止住。

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一天早晨，當時我是高二的學生，我們像往常一樣在上課 前全體起立，對著黑板上方的毛澤東標準像，齊聲說道：「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然後坐下朗讀起了語文課本裡有關毛澤東的段落,當時所有的文章在描寫毛 澤東形象時，一律只有八個字:紅光滿面，神采奕奕。

這八個字從我小學一年級的課本開始，一直延續到我高中二年級的課本，始 終沒有變化。就在我們剛剛朗誦完毛澤東「紅光滿面，神采奕奕」時，學校的高 音喇叭響了，打斷了我們的朗誦，通知學校全體師生立刻到禮堂集合，九點鐘有 重要廣播。

我們搬起了自己的椅子，走向了學校的禮堂。當一千多名師生都在禮堂坐下 後，等待了差不多有半個小時，九點鐘到了，廣播裡響起了哀樂。我立刻有了不 祥之感，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兩位重要領導人周恩來和朱德也逝世了，這一年 我們經常聽到廣播裡傳來的哀樂。

漫長的哀樂結束後，播音員沉痛的聲音緩慢響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會，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政治協商會議……

我等待了很久，才聽到這五個最高權力機構聯合發出的「訃告」一詞，播音 員的聲音繼續沉痛和緩慢地響著：「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 大的舵手……」我又等待了很久，才聽到毛澤東主席因病不幸逝世，播音員沉痛 的聲音還沒有說到「享年八十三歲」，我們學校的禮堂已是一片哭聲。

我們的領袖逝世了，我的眼淚也是奪眶而出。我在一千多人的哭聲裡哭著， 我聽到了呼天喊地的哭聲，聽到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哭聲，聽到了快要噎死般咳嗽 的哭聲……我的思維開始走調了，悲痛不再左右我，離奇的哭聲開始引導我。當 幾個人哭的時候，我感受到的肯定是悲痛，可是當一千多人同時在一間大屋子裡 哭，我感受到的卻是滑稽。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此豐富多彩的聲音，我心想就是 全世界所有品種的動物派出它們的代表，集合到我們中學的禮堂裡一起嘶叫，也 可能沒有比這一千多人的哭聲更加稀奇古怪。

這個不合時宜的念頭差點要了我的命，我忍不住偷偷笑了一下，又趕緊將後 面湧上來的笑給憋回去。在當時，一旦我的笑容被人發現，我立刻就被打成反革 命分子，我的一生就會因此完蛋。我使勁憋住自己的笑，可是笑在我體內迅速發展，馬上就要洶湧而出了。我知道快要憋不住自己的笑聲了，我極其害怕，我將 雙臂交叉地放到前面同學的椅背上，將腦袋深深地埋進自己的雙臂裡。我在一千 多人的哭聲裡，膽戰心驚地笑著，我愈是想制止自己的笑，愈是笑個不停。

坐在我身後的幾個痛哭流涕的同學，淚眼朦朧地看到我趴在前面同學的椅背 上，看

到我因為止不住的笑而劇烈抖動的肩膀。這幾個同學錯誤地認為我對毛澤 東的感情很深，他們後來這麼說：「余華哭得最傷心，他的肩膀抖動得最厲害。」

我在本書
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
也寫下了自己的疼痛。
因為中國的疼痛，
也是我個人的疼痛。

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
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
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
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
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
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
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
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